

## 編序

---

中國大陸在 1970 年代末仍實行集體經濟，成長緩慢且民生困頓。然而，自推行改革開放政策後，局面隨即轉變，發展動力強勁，經濟總量於 2010 年超過日本，居世界第二位，僅次於美國。若以兩岸三地來看，1981 至 2017 年間，其本地生產總值從原為香港的 6.3 倍增至 35.8 倍，原為台灣的 4.0 倍變成 21.4 倍（中華民國行政院主計總處，2018; World Bank, 2018）。

無論綜合國力、競爭力，或是國際地位與影響力，中國均今非昔比，其與周邊地區的互動和關係，亦有了巨大的轉變，對世界政經秩序的衝擊，甚至激起學術界對於西方自由體制在全球化過程中的存續思辨（如 Ikenberry, 2008）。中國崛起，尤其是其主導的「一帶一路」發展策略以及戰略布局對世界的影響，也引起世人廣泛關注，既有五花八門、愈演愈烈的「中國威脅論」，亦有對市場波動敏感的經濟學者說：「中國的好消息對全世界都將是好消息」（央視網，2017）。*The Diplomat* 雜誌曾先後刊出多篇以了解中國為主題的文章，從多角度分析其崛起在不同層面的效應與衝擊，其中 Friedman (2011) 的 *Understanding China's Global Impact* 一文，甚具代表性。

這些劇烈變化發生於全球經濟、地緣政治的合作與衝突，以及政治、社會、文化、科技、傳媒、人文與認同等領域；無論人們的政治偏好以及是否獲益，中國效應已經進入很多人的日常生活，構成利害與禍福關係，不論共榮或消長皆交織呈現，無人能置身事外，令「中國效應」（China impact）一詞無論在

國際關係、政經評論，或社交媒體上均大行其道，並因此吸引了研究華人世界學術界的關注（Schubert, 2016）。

所謂中國效應研究，旨在探究世界如何因為中國崛起（亦說中國再興）的事實或想像而改變，以及世界如何看待、接觸、參與，以至改變中國效應的過程，也就是對世界與中國的各種動態關係與變遷的研究。中國效應涉及人們對於過去歷史與認同的看法，故不局限於當代；各種動態關係發生的空間，涉及跨境、跨國、跨區域或跨體系的多層作用與效應傳遞，故不受限於地方、社區、社會或民族國家的疆界限定。中國效應研究的課題故常具有跨學科與跨生活領域範疇的性質（張茂桂，2011）。

對於中國效應，台港民眾都有直接深刻但未必一致的體會。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和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同仁，有感這「嶄新」現象尚缺乏實徵學術研究的問題，故於2012年開始合作，籌組進行台港的「中國效應」比較研究，深入而有系統地探討台港兩地各種可歸因於「中國崛起」的社會狀況、問題和變遷等議題，包括民眾對中國大陸社經政治前景的預期、對影響個人和本土社會的評估等。

此項合作研究的基本活動包括自2013年起，每兩年在台港同步進行一次全社會的隨機抽樣民意調查，然後根據調查所得撰寫論文，再召開學術研究會，<sup>1</sup>作多層面和多角度的討論。本書是相關民意調查和研討會的成果，結構上分為三個部分：中國效應、政經拉扯和交流互動，分析範圍則涵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傳媒和民間交流互動等眾多層面。

1. 包括2013年11月30日在台北政治大學舉行的「中國身影下的港台社會與民意反映」研討會，和2017年12月4日在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舉行的「中國效應與台港經驗」工作坊。

第一部分分析民眾對中國效應的觀感，收錄四篇論文。在第1章「『中國好，台港好』？台港民眾對『中國效應』的評估」，蕭新煌、尹寶珊和鄭宏泰運用2017年民意調查數據，勾勒在台港與中國大陸經濟關係日益緊密、人民交往愈趨頻繁的環境下，台港民眾如何評價「中國關係」對本土社會的影響，並借鑒相關理論，探討經濟利害得失、情感認同強弱，以及社會接觸多寡三方面個人因素，如何影響民眾的中國效應評價。作者首先發現，台港民眾對政治效應的評價，都以負面者居多；但台灣人對經濟效應的評價，卻遠低於香港人；兩地民眾對大陸經濟和政治前景的評估，則好壞參半。其次，民眾大多未認同與大陸是「命運共同體」的關係。這一方面表現於自覺家庭經濟依賴大陸、承認情感認同大陸，以及與大陸維持較頻繁接觸的民眾，均屬少數，台灣尤甚；另一方面，民眾雖基本認同「中國好」，如約半數相信其經濟會維持發展、政治會走向民主；但對於「中國好，台灣／香港好」，台灣是傾向負面，香港則存在矛盾。其三，影響中國效應評價的因素，台港不盡相同。對經濟效應評價具正向解釋力者，台灣只有政治展望，香港則有國族認同、社會接觸、經濟展望和政治展望。對政治效應評價具正向解釋力者，台灣有經濟依賴、國族認同和政治展望，香港則有經濟依賴、國族認同、經濟展望和政治展望。鑒於大陸的政經發展存在隱憂、認同中國的台港年輕人大幅減少、社會接觸對中國效應評價的影響力偏低，作者預期台港與大陸的融合前景不容樂觀。

在第2章「台灣民眾對於『同文同種』想像的初探」，張茂桂指出，一般用來衡量國族認同的「台灣人」與「中國人」調查，主張台灣民眾的「台灣人意識」有逐年上升，而「中國人意識」則不斷下跌的趨勢。然而，作者根據2011和2015年的民意調查所得，發現多達六成民眾同意「兩岸人民是同文同種」。這顯示，不少自我定位為台灣人而非中國人的民眾，也

同意「同文同種」的觀點。學術界對這看似矛盾的現象，一直缺乏深入的探究。作者指出，「同文同種」固然是兩岸交流中的流行話語，惟意義很不精確。當考慮所有變項時，具最大影響力的因素是政治世代：年輕的「中國因素世代」尤不同意「同文同種」的觀點，而最年長的「威權大中國世代」與較年長的「危機愛國世代」，則相對同意「同文同種」。其次是對兩岸發展的預期：對中國大陸未來發展較樂觀的民眾，也會較容易同意「同文同種」；反之，如果是預期台灣未來樂觀、中國大陸不樂觀，就會較傾向不同意「同文同種」。再次是民眾的政黨支持傾向和性別：泛藍政黨支持者和持中立態度者，相對於泛綠政黨支持者，以及男性相較於女性，都增加同意「同文同種」的機率。

在第3章「中國效應下台灣民眾的選擇難題：經濟利益或國家主權」，陳志柔利用2013、2015和2017年的民意調查資料，探討台灣民眾對於兩岸交流協商中，經濟利益或國家主權的取捨衡量。作者指出，當民眾被問及：「對於兩岸交流的協商，有人認為台灣的經濟利益重要，有人認為台灣的國家主權重要，請問您認為哪一個比較重要？」時，認為經濟利益比較重要者（約佔五成至五成半），略多於認為國家主權比較重要者（約佔四成二至四成半）。對於選擇經濟利益還是國家主權，個人的社經地位、政黨支持、台獨情感、對中國大陸政府的評價、對中國大陸經濟的判斷等因素，都有顯著的影響。大致而言，高社經地位人士（以收入和教育程度為指標），比低社經地位人士，傾向認為經濟利益比較重要。泛綠政黨支持者和有台獨情感者，較泛藍政黨支持者和沒有台獨情感者，傾向認為國家主權比較重要。對中國大陸政府評價高者、認為中國大陸的經濟會一直維持快速發展者，都較傾向認為台灣的經濟利益比較重要，反之則認為國家主權比較重要。另外，就人口特質而言，

女性較男性傾向認為經濟利益比國家主權重要；年輕世代較中年世代傾向認為國家主權比經濟利益重要。

在第4章「中國效應對台港民眾政體評價的影響：政體競爭觀點的初探」，林文正和林宗弘指出，政體存續多少取決於執政績效，尤其是經歷政體轉型的新興民主國家，民眾往往以舊政體作為比較的基礎，若績效不彰，可能會令民眾失望，甚至釀成執政當局的合法性危機。作者運用「政體競爭」的概念，以2013和2016年的調查資料為例，探討政體對民眾的「政體評價差距」影響，並以「政治社會化」與「制度績效」觀點，來解釋不同政體對個人的社會化效果；此外也觀察時間因素所產生的影響。中國大陸的威權體制，對於台灣民眾是現行民主體制的比較標的，對香港民眾則是現行體制的對照來源。研究發現，政治社會化與制度績效可以有效解釋台港民眾政體評價的差距，其中制度績效（包括台港政府評價、大陸政府評價、大陸經濟持續發展與經濟衍生的政治效果）對於評價差距有重要的影響，這說明制度間的績效表現，是台港民眾的評價對照來源。最後，比較兩波調查的時間效果，可發現台港民眾在政治社會化因素出現相近的變動，這很可能是2014年兩地先後發生大型的社會運動，使政黨傾向或身分認同因素對政體評價的影響力增加，這表示政體評價差距，除考量制度績效之外，還須關注政體競爭過程中對個人政治社會化的潛在影響。因此，政體競爭的角度不但能反映台港民眾如何看待不同體制的差異，也為政治社會化帶來新的討論議題。

第二部分探討中國效應導致的政經拉扯，共收四篇論文。對於兩岸關係，「維持現狀」既是台灣的主流民意，也是現政府的執政定位。有鑒及此，廖美在第5章「鞅韃或槓桿？政治維持現狀與兩岸經濟發展的弔詭」，將民眾選擇「維持現狀」的內涵歸為兩組：一是如同鞅韃，在一定範圍內擺盪，但其實沒有進退；另一如同槓桿，藉維持政治現狀，以尋求經貿發展

的利益。作者繼而檢視「維持現狀者」對兩岸經貿關係的評估，從中探究他們的「組內」差異，以及影響其差異的因素。作者認為，民眾選擇維持現狀，直觀看似「不求變」，但選擇「當下」，實已包含對未來的預期。民眾對兩岸經濟發展的評估，不管樂觀或悲觀，都在對政治後果和經濟利益進行權衡。總言之，作者使用鞦韆和槓桿作類比，旨在針對兩種態度的理念型提出可檢證的假設：其一，對兩岸經濟發展持悲觀態度者，選擇維持現狀是基於政治後果考量，如同坐在擺盪的鞦韆上，識時務地堅持不前進策略；其二，對兩岸經濟發展持樂觀態度者，選擇維持現狀是基於政治槓桿操作，以期獲取最大的經濟收益。

在第6章「追求民主，還是其他？港人對中央政府支持度下降的原因」，黃子為、尹寶珊和鄭宏泰以2014年數十萬港人上街支持佔領運動，抗議中央政府有關香港政制改革的決定，並要求民主改革一事作為切入點，指出有輿論認為，港人對中央政府不滿，是本地民生問題叢生，以及香港與大陸融合產生諸多衝突所致，民主因素未必是主因。然而，當作者運用2017年民意調查數據作檢測後發現，支持民主的港人，無論在兩地關係對香港民主政治的影響、兩地經濟關係對維護「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影響、中央政府的整體表現上，均給予較負面的評價，亦較認同佔領運動，主因是他們認為中央政府阻礙香港的民主發展。此外，分析結果顯示，身分認同、兩地關係對香港經濟和社會的影響評估，與佔領運動認同感沒有顯著的關聯。因此，作者認為，單憑加強港人國民身分認同，和增強兩地融合帶來的經濟利益，未必能夠有效增加港人對中央政府的支持。

在第7章「人心何價？香港與內地經濟和政治關係認知的影響」，梁凱淇和黃子為集中探討京港政要常說的「國家好、香港好」是否廣受港人認同。作者提出三個問題：一、港人是否相信香港在國家經濟布局中，兩地能互利共生？二、港人是否相信更強勢的中國和更緊密的兩地經濟關係，對香港有利？

三、香港的人心可否因此被收攬？然後利用2017年的民意調查數據，分析「國家好、香港好」的論述，到底獲得哪些港人在經濟和政治方面的認同，以及探討港人對兩地政經關係的認知，如何影響他們對國家的認同，包括中央政府的評價和身分認同，以了解此論述能否在香港回歸20年之際達到人心回歸的效果。主要的結果有三：其一，年輕和高學歷人士，較不傾向認為「國家好、香港好」；其二，相信「國家好、香港好」的「一榮俱榮」者，對中央政府的評價，都較其他人正面，顯示收攬民意需要政經雙管齊下；其三，「一榮俱榮」者的身分認同，與其他人沒有統計上顯著的差異，經濟關係認知是「此長彼消」者反較傾向認同中國人身分。簡言之，相信「國家好、香港好」與中央政府評價呈正相關關係，與身分認同則沒有關聯。

在第8章「意料之外的政治覺醒：世代與港人的身分認同及政治取態」，葉瀚璋和趙永佳指出，中國政府於2014年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簡稱「831決定」），觸發香港自回歸以來規模最大的社會運動，但那場運動其實醞釀已久，並非空穴來風，在歷時79日的佔領運動之後，又捲起了本土主義浪潮，令本土認同從此被喚醒、社會朝兩極分化之說甚囂塵上。為驗證此說，作者運用2013和2017年的民意調查數據，分析港人身分認同和政治取態的變化，以及世代間的差異。研究結果清楚展示，這場運動對年輕人影響輕微，但帶來了較年長者的「政治覺醒」。作者因而推斷，香港將面臨更嚴重的世代政治衝突。

第三部分着眼台港與中國大陸的交流互動，共收四篇論文。在第9章「兩岸交流之利與台灣社會：國民黨執政時期（2011–2016）的探究」，張茂桂指出，2012年，台灣的國民黨擊敗民進黨成為完全執政黨，相關分析多認為兩岸和平與預期經濟紅利是決定因素，但到2016年，在和平與經濟紅利取得「落實」

機會之後，選舉結果卻是國民黨大敗、民進黨重掌政權。這現象帶出的問題是：2016年之前的兩岸經濟紅利究竟讓誰獲利？民眾如何看待這些「紅利」？這樣的獲利分配與台灣社會持續存在的分歧有何關係？為回應上述問題，作者運用2011、2013和2016年的民意調查資料，發現民眾對於「整體經濟是否有利」的評估趨於分歧的觀感，抵銷了早期對經濟紅利的正面期望效益，但對於「個體家庭是否受惠」的現實評估，則確實有趣高的情形。此外，民眾對家庭獲利與否的觀感，不純粹是政治立場的延伸，而是與年齡、族群、教育程度、地區發展程度等分歧有所重疊。最後，根據作者的判斷，同樣的經濟利益評估問題，存在究竟是「前瞻」（預期）或是「回顧」（現實）評估的差異，測量的時間點與民眾的參照點，有不同的政治影響。此外，民眾對於整體和個體的受惠評估，只有中度的相關關係，且兩者呈現不同的發展趨向。

第10章「有關係，沒關係？談台港民眾與中國大陸的關係」的分析重點自然是社會關係。鄭宏泰、蕭新煌和尹寶珊指出，在處理台港與中國大陸的接觸交往議題時，社會關係是基本的切入點，學術界與政界尤其認同增加接觸交往，會影響民眾的態度與行為。作者根據2017年的民意調查所得，發現台港民眾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強弱，會影響他們對大陸的態度與行為，呈現了關係較強者，對大陸政府的評價較正面，對大陸社會的前景抱較大信心，並較支持家人到大陸發展。然而，民眾與大陸有否關係的影響，則不盡相同。儘管在台灣民眾中，與大陸有或沒有關係，仍會影響他們對大陸的態度與行為；但香港民眾卻非如此，背後所反映的社會現實，是香港仍有濃厚的移民社會色彩，上一代和新世代中同樣有很大比例的大陸移民，而新舊世代亦會在不同生活領域接觸來自大陸的親友，可見就算那些與大陸沒關係者，亦不能置身於社會關係的場域之外。

第11章「內地來港年輕移民二十年以來的社會流動」關

注香港回歸後年輕移民的收入轉變。郭樺和方偉晶指出，移民的經濟融入程度，是移民社會流動的重要指標。在分析移民的經濟融入時有兩個主要視角，其一關注移民的人力資本因素，其二關注移民的移居時間長短，和移居時的年齡因素對其社會流動的作用。作者結合兩種視角，運用2006和2016年香港中期人口統計的5%抽樣樣本，以及Myers和Lee的「雙同期群分析」，比較年齡同期群和來港時間同期群在2006至2016年的收入表現。研究結果顯示，在控制教育程度後，於1997至2006年來港的移民，他們的收入與本地人已沒有顯著的差別；25至34歲時來港的移民，他們的收入與本地年輕人的差別，相比年長時來港的移民小。據此推論，香港回歸後，針對移民的制度環境改善，以及移民的教育程度提高，是提升移民經濟融入程度的主要原因。

第12章「傳媒的視角與力量：台港民眾的不同看法和感受」，分析中國效應下台港民眾如何看待俗稱「第四權」的傳媒，在報道新聞時的手法和影響。文中，趙永佳、張茂桂和鄭宏泰首先回顧二戰結束卻掉進冷戰時期後，台港與中國大陸如何利用傳媒發動宣傳戰與輿論戰，影響政經政策，並指出進入新千禧世紀以還，傳媒生態雖有巨大變化，但因其仍被視為具有治理「制高點」作用，依然備受各方重視。然後，作者運用2013年的民意調查資料，展示台港民眾對兩岸三地新聞關注程度的差別，以及對傳媒中立性的看法，最後則綜合各種資料，分析並思考傳媒如何在不同層面上，影響了台港的政治氛圍與社經發展方向。

總括而言，本書各篇論文大都運用由台港「中國效應」研究小組進行的民意調查資料，就台港與中國大陸的關係現況和趨勢，提供敏銳的觀察、實徵的數據和客觀的分析。由進行民意調查、籌辦研討會，到本書得以問世，我們要特別感謝此一計劃的推手，時任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蕭新煌教授的

鼓勵與促成，以及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兩個機構的長期支持。另外，對參與歷次調查和研討會的專家學者，我們由衷地感謝，而香港亞太研究所的鍾雪怡、李明珠、梁月蓮和陳韻晴協助資料分析和文稿校對等工作，以及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的蔡宜紋、王振瑜、施翔云、洪鳳謙、楊靜雯、吳家裕、周偉賢諸位研究助理和林肇豐博士等協助，在此也謹誌我們的謝忱。

張茂桂、尹寶珊、陳志柔、鄭宏泰  
2018年7月

## 參考書目

- 中華民國行政院主計總處。2018。「國民所得統計摘要（107年5月更新）」（<https://www.dgbas.gov.tw/ct.asp?xItem=33338&ctNode=3099&mp=1>）。
- 央視網。2017。「IMF首席經濟學家談中國經濟：中國的好消息對全世界都將是好消息」，10月11日（<http://news.cctv.com/2017/10/11/ARTIs6qYJszue4z2QBSYg6N6171011.shtml>）。
- 張茂桂。2011。「倡議『中國效應研究』的觀點」，《臺灣社會學會通訊》，第72期，頁25-30。
- Friedman, Edward. 2011. "Understanding China's Global Impact," *The Diplomat*, 15 February (<https://thediplomat.com/2011/02/understanding-chinas-global-impact/>).
- Ikenberry, G. John. 2008.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Foreign Affairs*, 87(1):23-37.
- Schubert, Gunter (ed.). 2016. *Taiwan and the "China Impact":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London: Routledge.
- World Bank. 2018. "Data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home>).

# 2 台灣民眾對於「同文同種」 想像的初探

張茂桂

## 引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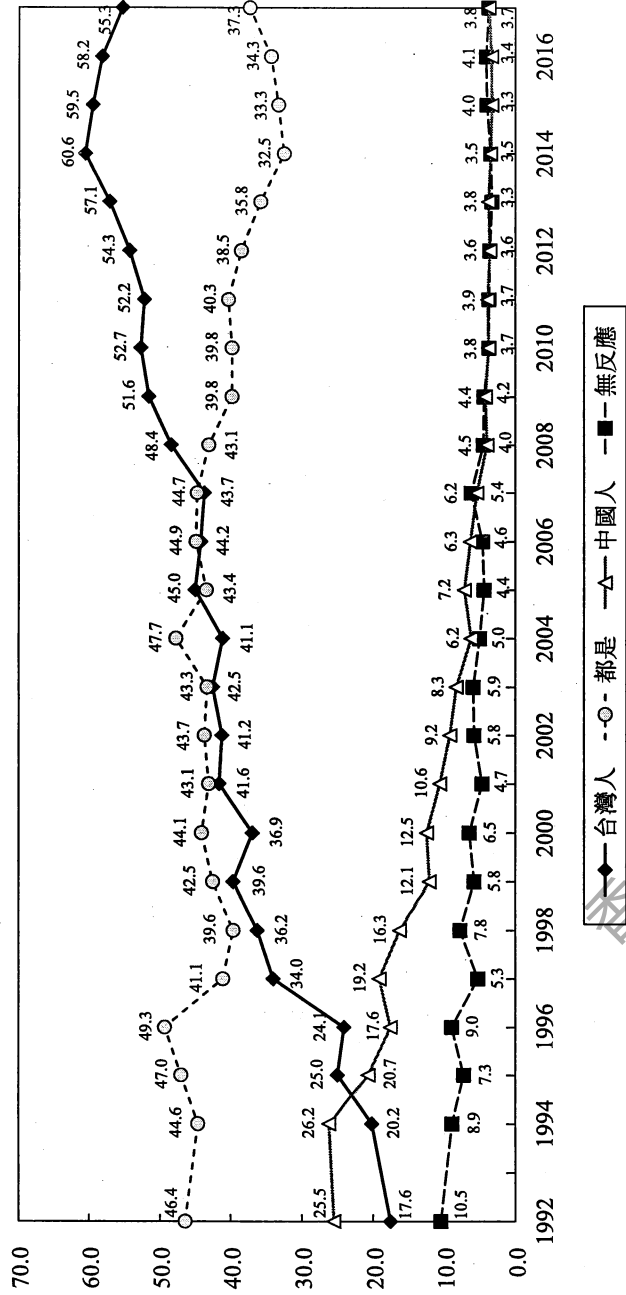
當討論台灣民眾的「認同」問題時，幾乎都會參考台灣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簡稱「政大選研」）的資料。政大選研從 1992 年開始詢問受訪者：「我們社會上，有人說自己是『台灣人』，也有人說自己是『中國人』，也有人說都是。請問您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中國人』，或者都是？」而研究者習慣將受訪者的回答分成四類：「台灣人、中國人、都是，及無反應」，依此觀察長期的趨勢變化。

圖 1 顯示，自 1992 至 2007 年間，台灣民眾的認同，認為自己為「都是」者屬相對多數，但「台灣人」的比例有向上攀升的趨勢。在 2001 至 2007 年間，「台灣人」的比例，原來在

---

\* 本文修訂自「台灣民眾的『同文同種』想像」，曾發表於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主辦之「太陽花運動與中國效應」工作坊（2015 年 10 月 16 日，台北）。作者感謝評論人許維德教授及與會者的評論與建議。

圖 1：台灣民眾對台灣人/中國人認同的趨勢，1992-2017 (%)



資料來源：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2018)。

41% 至 45% 間起伏，屬相對穩定，但是自 2008 年開始，「台灣人」比例開始超越「都是」的比例，從 2009 年起，一直維持超過五成，為絕對多數。而在太陽花運動（2014 年 3 月 18 日至 4 月 10 日）發生的前後時期之調查，自認為「台灣人」的比例，更達到 60% 左右的高峰。

相對於此，回答「都是」的所謂「雙重認同者」，1996 年時曾達近半數 (49.3%)，之後則下降到 41% 至 44% 之間波動，並於 2004 年小幅回升到 47.7%，但從此之後的趨勢呈現下滑，2014 年後大約在 32% 至 34% 左右。

至於回答「中國人」的比例，則趨勢下滑明顯，從 1992 年約四分之一 (25.5%) 開始往下，至 2010 年後持續都不超過 4.0%。

此長期趨勢圖讓人們相信：台灣的政治自主意識在上升，反映在認同趨勢的變化是「台灣人認同正逐年上升，且大幅度壓倒中國人認同」。及至 2014 年，馬英九執政後期發生太陽花運動之後，則更加明顯。而「台灣人認同」的緩慢增加，在 2004 年以前，與「中國人認同」的快速減少有關，但從 2008 年起，則主要是和「都是」者，所謂「雙重認同」民眾的減少，呈現同步的變動關係。<sup>1</sup>

1. 2008 年馬英九勝選總統、國民黨重新執政後，不斷加強與中國和解及更親近的政策，然而，在此期間雙重認同者明顯下降，同時期的台灣人認同則是持續增加。有主張指此時期的「中國因素」對於台灣民心產生作用，導致台灣人認同升高（吳介民，2015:23），並在太陽花運動時期達到高峰。但從圖 1 可知，太陽花運動落幕之後的調查結果顯示，「台灣人」的比例出現些微下滑，而「都是」則反向些微上升，這仍有待繼續觀察。從另一份由台灣民意基金會發表的 2016 至 2017 年資料來看，兩年調查相比，雖然台灣人認同仍為多數（2016 年 80.8%，2017 年 72.0%），但台灣人認同減少 8.8 個百分點，



雖然一般而言，各界都依賴此測量指標來代表特定的「認同」變遷，不過大家對於「認同」這個概念，可能各有各的見解。因為研究者對於如何解釋此數據，或者如何賦予其一個特定的概念名稱，仍然沒有定論。不同的研究者認為上述調查反映了台灣人相對中國人時的「台灣認同」，或者「族群認同」、「國族認同」、「民族認同」幾個近似的概念，這表示大家對於台灣人（及中國人），可能將其想像成一種族群、國族，或民族等幾個不同的政治或國家的意涵，甚至語焉不詳。<sup>2</sup>

張茂桂與陳俐靜（2013:203-04）曾指出，此測量或可用來呈現民眾的「民族認同」的表徵，但是用來反推這就是台灣的「民族／認同」的內涵或真實面貌，就會有過度推定與簡化之疑慮。但是針對此測量問題，台灣的研究者其實不夠深究，除吳乃德（1993）以「條件式統獨」作為測量民族主義態度的指標外，也甚少突破。<sup>3</sup>

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的中國效應主題研究小組

中國人認同增加 2.5 個百分點，雙重認同也增加 4.5 個百分點。對於這種變化，該基金會提出：「為何民進黨重返執政一年多後出現這種台灣認同倒退的現象？這究竟和蔡英文總統的領導方式有什麼樣的關聯性？」（游盈隆，2017:iii）。

2. 例如張傳賢、黃紀（2011:4-5）認為此項測量可能呼應國家認同、國族認同，但是在文章內卻又使用「族群認同」加以說明。
3. 除了以「是台灣人或中國人」作為判定受訪者的民族／族群認同之方式，在台灣的國家／國族認同研究，大多會參考吳乃德（1993）的民族主義態度測量，他使用「有條件統一」與「有條件獨立」的兩條假設性問題加以交叉，重新建構出台灣人的統獨立場（或偏好）類型：台灣民族主義認同、中國民族主義認同、雙重認同（現實主義者）、維持現狀。在他後續關於「麵包與愛情」（2005）、「媽祖與腹肚」（2013）的系列研究中，還有更深入的探討。

（簡稱「中國效應小組」）於 2011、2015 年進行全台灣電話調查，對此設計了另外一條相關題目：「有人說台灣和中國大陸兩岸的人民都是『同文同種』，<sup>4</sup> 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為什麼有此提問呢？除了想對過去「中華民族想像」研究作新的嘗試之外，還有以下兩個理由：

一、晚近「同文同種」作為話術，最常出現於兩岸交往關係之語境，它具有拉近陌生關係、克服歧見等非常工具性或現實的作用。在同一語境中，除了「同文同種」，相去不遠的正面敘述包括：血濃於水、民族情感、骨肉相親、血脈相連、「兩岸一家親」等，而相關的負面敘述有：民族罪人、分裂國家、傷害人民或民族感情、撕裂兩岸等。上述語詞，使用於正式或非正式、政治或民間的商業與文化活動，其終極意涵為「統一的中國」，以及「中華民族共同體」，而「同文同種」是這個語境最常用的「開場白」、「通關語」。

二、在行為實作上，台灣民眾的日常生活中，不管是重要的民俗節日或時令節氣（如春節、元宵、端午、中元、中秋）、主要信仰（如佛教、道教、民間信仰），都和中國，特別是與中國東南地區的文化習俗十分接近，且具有以中國大陸為信仰及習俗起源的意義。而台灣官方過去也十分尊崇儒學，<sup>5</sup> 強調中國古典與近代文學、歷史、地理的國民教育，這也使得晚近兩岸重新開始交流時，有對話的基礎。台灣已故的商場龍頭王永慶在接受記者採訪時，為了合理化對中國大陸的投資而表示：「兩岸既是同文同種，有如兄弟」（邱展光，2001）；世界馳

4. 當訪員使用台語訪問時，「同文同種」的講法是「同文化、同種族」。
5. 例如在 1995 年 10 月教育部修訂頒布的《高級中學國文課程標準》中，教學目標第三條：「研讀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培養倫理道德之觀念、愛國淑世之精神。」

表 1：對兩岸人民屬「同文同種」的回答 (%)

	2011	2015
很不同意	16.8	15.2
不同意	18.2	21.0
同意	44.0	40.0
很同意	21.0	23.8
(N)	(1156)	(1227)

注：本表數值為加權後結果。2011 和 2015 年的平均值為 2.31 和 2.72。

名的佛光山星雲 (2015) 法師在「馬習會」於新加坡舉行後發表：「大家同是在中華文化熏陶下的中國人，……兩岸本是同宗、同族」之論述。

綜合言之，強調過去的「同種族」、「同血脈」、「同文化」，現在更需要進一步加強「兩岸合作」、「攜手共榮」，以此為根基，期望「振興中華民族」。在這類兩岸交流時作為拉近關係的話語中心，顯而易見的是以一種民族想像，貫穿兩岸政治、經濟、文化、日常生活，而達到「不分家」、「不分裂」、追求融合一體的目標。然而，就着台灣民眾的日常生活來說，民眾想像的「同文同種」，可能也有其習慣、自然、客觀事實等非政治性認同的一面。根據以上理由，中國效應小組提出「兩岸人民屬同文同種」題目進行訪問，將回答分成四類：很不同意、不同意、同意、很同意（回答其他者，不列入分析對象），其結果如表 1。

2011 年時，民眾對此問題回答「同意」的達到 65.0%（很同意 21.0%、同意 44.0%），而「不同意」者相對較少，只有 35.0%（很不同意 16.8%、不同意 18.2%），贊成「同文同種」者是反對者的 1.86 倍。時至 2015 年，「同意」者略減至 63.8%（很同意 23.8%、同意 40.0%），「不同意」者為 36.2%（很不

表 2：「同文同種」與自我定位列聯表，2015 (%)

自我定位	兩岸人民屬「同文同種」				合計
	很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很同意	
台灣人	19.1 [94.6]	26.1 [92.6]	39.2 [73.9]	15.6 [49.5]	[75.2]
中國人	1.4 [0.5]	5.6 [1.6]	33.3 [5.0]	59.7 [15.0]	[6.0]
都是	3.9 [4.9]	6.6 [5.9]	44.7 [21.2]	44.7 [35.5]	[18.9]
合計	15.2	21.2	39.9	23.7	

注：本表數值為加權後結果。樣本數為 1,209。[ ] 方括號內數值為直行百分比，其他為橫列百分比 ( $\chi^2 = 187.897$ ,  $p < .001$ ,  $df = 6$ )。

同意 15.2%、不同意 21.0%)，贊成「同文同種」者是反對者的 1.76 倍。整體而言，兩個年度的數據相差有限，即使在 2015 年時，台灣經歷了太陽花運動，一般公認為影響政治、經濟、社會各層面甚巨的變動，然而，這兩次有關贊成「同文同種」與否的調查，支持的百分比雖有下滑，但並無如預期呈現明顯改變。

如果拿表 1 和前述慣見的「『台灣人認同』壓倒『中國人認同』」的發現對照，研究者必須面對這種看似矛盾的困擾：為什麼會有超過半數、達六成或更高比例的民眾仍然贊成兩岸人民為「同文同種」？顯然是那些選擇自我定位為台灣人而非中國人的民眾，也有同意「同文同種」的可能，從「認同」研究的觀點，我們要如何理解這種歧異呢？

表 2 呈現的是 2015 年「同文同種」與自我定位的交叉分析。我們假定，「贊成同文同種」者應該是與「台灣人認同」為負相關，而與「都是」或者「中國人認同」為正相關。結果顯示，這兩個變項的相關係數 (Cramer's  $V = .279^{***}$ )，雖然呈現相

關，但數值不高，不如預期。自我定位是「中國人」的受訪者，他們的意見顯得較為一致，絕大部分贊成「同文同種」的說法（93.0%）。另一方面，「都是」的認同者，也有達 89.4% 的人贊成「同文同種」。但是自我定位為「台灣人」的受訪者，對此問題的反應就比較分散，有 39.2% 表示「同意」「同文同種」，15.6% 表示「很同意」「同文同種」。換言之，就算在自認為是「台灣人」的台灣認同者當中，也有合計超過半數（54.8%）對於「兩岸人民屬同文同種」之說法都表贊成。

本文主旨在於「同文同種」意涵的初探，是台灣學術界首度對此問題進行研究，故稱為「初探」。原來在最抽象的層次，它是關於國族或民族認同的研究，除了傳統「是台灣人或中國人」的自我定位之問法，是不是還有別種國族或民族認同的測量方式？本文將之縮小為可操作的層次，嘗試以受訪者是否贊成「兩岸人民屬同文同種」的習慣性話語作為研究主題，探究不同身分背景、政治立場的台灣民眾，他們如何看待「同文同種」？我們一方面希望了解台灣民眾如何想像「同文同種」、又是如何分化，藉此思考「同文同種」所具有的國族認同意涵，也可反向思考我們對於國族認同一貫的研究不足之處。

## 資料來源與研究方法

本文以「兩岸人民屬同文同種」議題進行分析，研究資料是中國效應小組在 2011 與 2015 年進行的全台灣電話調查，<sup>6</sup> 並

6. 2011 年調查是在 1 月 14 至 24 日進行正式訪問；實際完訪 1,217 案，在 95% 的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為  $\pm 2.9$  個百分點。2015 年正式調查期間為 1 月 13 日至 2 月 3 日；實際完訪 1,277 案，在 95% 的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為  $\pm 2.74$  個百分點。調查資料請參考：[https://srda.sinica.edu.tw/datasearch\\_detail.php?id=1139](https://srda.sinica.edu.tw/datasearch_detail.php?id=1139) 及 [https://srda.sinica.edu.tw/datasearch\\_detail.php?id=2529](https://srda.sinica.edu.tw/datasearch_detail.php?id=2529)。

針對 2015 年的資料作更深入的研究。此系列調查均由中國效應小組成員共同設計。本文的分析分兩階段進行，每階段皆以「同文同種」為依變項，使用不同的獨立變項進行探究。「同文同種」原屬順序尺度變項，答項分別為「很同意」、「同意」、「不同意」、「很不同意」，後經重新編碼（同意 / 不同意）為二元類別變項，進行層級迴歸分析（hierarchical regression）。

## 自變項的解釋與說明

第一階段所探究的自變項有四項個人社會屬性，包括：性別、族群、教育程度與年齡。我們又將年齡編成三種不同的年齡層分類：一、自然年齡；二、教改世代年齡，即以「是否經歷台灣教育改革」為分野的年齡世代估計；三、政治世代年齡，即「是否經歷台灣重大政治經濟改變或衝擊」的年齡世代估計。其次針對相關社經特質、不同年齡分組，進行層級迴歸分析，找出最適的年齡分類方式後，再進行第二階段的迴歸分析。

在第二階段的層級迴歸分析中，我們增加受訪者的政治態度作為自變項。選定的政治態度變項有二：政黨支持與兩岸消長預期。

本研究所使用的上述變項，以及其操作性定義，敘述如下：<sup>7</sup>

性別：以女性為參照組；女性和男性各佔 50.5% 和 49.5%。

族群：<sup>8</sup> 以外省人為參照組（11.2%），其餘有客家人（13.2%）、閩南人（72.0%）、台灣原住民（1.6%），以及其

[php?id=1139](https://srda.sinica.edu.tw/datasearch_detail.php?id=1139) 及 [https://srda.sinica.edu.tw/datasearch\\_detail.php?id=2529](https://srda.sinica.edu.tw/datasearch_detail.php?id=2529)。

7. 基本變項的次數分配請參考附表 1。

8. 問題為：「請問您的父親是台灣客家人、台灣閩南人、外省人（大陸各省市）還是台灣原住民？」1945 至 1956 年戰後隨

他族裔背景（0.3%，如新移民、新住民及其子女）。後兩者由於樣本數過少，未能涵蓋於後續的統計分析。

教育程度：<sup>9</sup>以國小及以下者為參照組（15.5%），其他依序漸升的類別有：國初中（12.8%）、高中職（28.6%）、專科（12.4%）、大學及以上（30.3%）；拒答（0.4%）設為遺漏值。<sup>10</sup>

年齡：原為出生年，屬於連續變項，本研究依照不同研究策略，重新編組為以下三類：<sup>11</sup>

一、自然年齡，分為六組：考慮自然年齡，每十歲為一組。以29歲及以下為參照組（17.1%），屬最年輕的受訪者，之後每間隔十歲設為一組，70歲及以上為最高齡組（11.7%）。<sup>12</sup>

國民黨政府到台灣者，歸為外省人；1987年兩岸開放探親後到台灣結婚者，歸為新住民。

9. 問題為：「請問您的最高學歷是？」肄業、在學中等同畢業；高中同等學歷算高中。
10. 教育程度回答「其他」者（四人）已依其開放題原始答案重新加回，因此本題次數與未加回的次數有所不同，高中職增加一人、專科增加二人、大學及以上增加一人。
11. 林宗弘（2015）整理台灣多篇世代政治研究文獻並比較其年齡、時期與世代（簡稱APC）之發現，以「國家認同」為例，年長者、年長世代較支持統一，年輕者、年輕世代較支持獨立；時期愈近，統獨立場相對穩定，台灣認同持續增強，但在新世代中，雙重認同仍較多。同時使用APC作為自變項會有多重共線性問題，因此林宗弘採用交叉分類隨機效應模型（cross-classified random effects model, CCREM），研究可知：世代政治效果顯著但複雜，時期效果最強，在抽離世代與轉型政治效果之後，年齡政治效果不算顯著。然而，由於資料限制，本研究無法使用CCREM進行分析，因此選擇在第一階段先進行不同年齡分類方式模型的比較。
12. 本研究將受訪者出生當年設為1歲。依照原始題目設計，在

二、教改世代年齡，分為兩組：考慮教育改革（教改）的作用，本研究以「是否經歷台灣教育改革」，分成「教改後」、「教改前」兩組世代年齡。教改是一個過程，自1987年解嚴後，民間陸續向政府提出教改的訴求，希望能擺脫威權體制的控制，從由黨國主導、強調愛國、民族教育的政策轉而民主化、自由化。及至1994年教改大遊行後，政府接納民間團體的建言，陸續訂定教育基本法、師資培育法、重新修訂課綱、教科書開放民間出版社編印等，除了促使台灣的教育更加開放外，課程更加強調台灣本土化的學習內容，這後來被大中國主義者批評為是「去中國化」與「台灣分離意識」的起始點。<sup>13</sup>本研究定義「教改後世代」為「1998年時16歲及以下者」，也就是在2015年調查進行時為33歲及以下者，並以此世代為參照組。

為何以1998年的16歲作為區分？因為雖然台灣的教改運動者認為1994年為「教改元年」，但由政府主導之教改落實推

詢問受訪者出生年分後，若回答不知道、拒答，會續答年齡層（約2.4%）。自然年齡之分組參考前述兩題重新編碼，故因不知道或拒答而列遺漏值者較少（N=1,274），但教改世代年齡與政治世代年齡（二者N=1,247）無法參考續答題再重新編碼，因此三種年齡層的分組之樣本數會有不同。

13. 教育政策在威權體制之下如何受到黨國的控制，可參考王錦雀（2001）、吳清山（2006）、周祝瑛（2003）對於教改的推動、歷程、影響、問題等較詳細的討論。在經過一連串的教改後，黃光國等（2003）曾發表「『終結教改亂象，追求優質教育』宣言（教改萬言書）」痛批教改，意欲推動二次教改。2014年，著名的親中學者、曾引發歷史課綱微調爭議的召集人王曉波認為太陽花運動的爆發，是由於「20年『教改』大搞『去中國化』，催生了『台獨』新世代」（李煒娜，2014）。王將台灣新世代政治意識轉化，簡單歸因於教改，並非嚴謹學術的成果，主要還是政治論述與對於時政的批判。

動是起始於 1998 年，<sup>14</sup> 故以「1998 年受訪者是否正值 16 歲」作為分隔，據此認定「教改後世代」中，最年長者在 2015 年調查進行時正值 33 歲，估計他們在 1998 年為高中或高職教育階段的一年級新生，凡比他們更年輕的受訪者，皆劃分屬經歷過教改的「教改後世代」（24.0%），而比他們年長的，2015 年時超過 33 歲者，推估仍接受原有的教育內容直到高中或高職畢業，定義為未經歷教改的「教改前世代」（73.6%）。

三、政治世代年齡，分為五組：這是考慮到不同的政治氛圍對於當時年輕人的影響。政治世代指涉重大的政治事件與持續的政治氛圍、衝突動員，及具有支配性的政治話語，會對於不同時期成長的受訪者造成影響。<sup>15</sup> 由於台灣法律規定，20 歲具選舉權，為成年公民（被選舉權另有年齡規定），因此本研究將 20 歲，<sup>16</sup> 視為成人正式政治社會化之開端，並據此定義政

14. 「教育改革推動小組」在 1998 年 1 月正式成立，同年 5 月 14 日，行政院通過「教育改革行動方案」，編列五年約 1,570 億新台幣的經費推動教改的重點工作。

15. 蕭阿勤 (2005:4, 8) 認為：「重大的傷痛事件 (traumatic events)，是激發年輕世代產生強烈世代意識的主要因素。……年輕世代在政治上的相近反應，尤其反映國民黨關於國族認同的學校教育與社會教化，有相當明顯的同化效果」。林宗弘 (2015:401) 延續蕭阿勤的觀點，也認為：「臺灣雖然可能仍有年齡政治問題，對歷史事件之不同集體記憶所造就的『政治世代』才是最重要的政治分歧來源。」本文認為，重大的政治事件一定與集體生存或價值有關，但並不一定會造成重大的傷痛。然而，因重大事件而持續發酵的政治氛圍、政治動員與政治語言，對於不同世代會發生不同的作用，其影響方向並不一定是一致的。

16. 李靜婷 (2010) 在有關台灣政治世代的研究，整理歷年來世代的劃分，有年滿 12、15、18、20 歲等方式，也有以本省籍、外省籍再配合年齡的分法，端視研究者如何假設，並沒有定

治世代年齡之劃分原則：當重大政治變化發生之年分，如受訪者當時若是正值 20 歲的新公民，他所經歷或目擊的重大政治變革將會持續對其發生影響，因此以當年 20 歲作為一個新的政治世代的開端，直到發生下一個重大政治變革，再區隔出下一個新的政治世代。

自 1949 年國民政府撤退來台至今，台灣歷經過多次劇烈的政治變革，本研究考慮戰後台灣的政治與社會情勢，選定五次重大的政治轉折，<sup>17</sup> 並配合前述時值 20 歲為該世代開端的定義，以下分別陳述（時間由近至遠）：

一、2008 年時值 20 歲，開始為「中國因素」世代。2008 年在國民黨重返執政後，兩岸關係相較於先前由民進黨執政的時期（2000–2008 年），開始有較快速的「和平發展」。然而，當 2012 年快速傾向一個中國、中國對台灣影響快速上升之際，兩岸的熱烈交流反而刺激了台灣境內的反對聲浪，並導致「自己的國家自己救」的太陽花運動。本研究稱此時期為「中國因素」世代。

二、1996 年時值 20 歲，開始為「民主本土化」世代。李登輝於 1996 年當選台灣第一屆民選總統後加速修憲，而在此稍早之前，已經大力推動「生命共同體」與社區總體營造。他透過修憲與黨改造，削弱國民黨內之保守與大中國主義勢力，鞏

論。例如，在劉正山 (2016:32, 41) 的研究中，是將 18 歲視為一個世代的起點，並發現：「『一個中華民國，不同世代各自表述』的認同樣貌反映了臺灣當前不同世代的民眾因為個人成長歷程、生活經驗與政治社會化而產生的政治認同習慣領域。」本研究以「具選舉權」作為劃分世代的依據。

17. 參考李靜婷 (2010) 關於政治世代研究中重大政治或經濟事件的整理，主要有：1949 年國民黨撤退來台、1965 年美援停止、1971 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1986 年政治自由化、1992 年國會全面改選。

固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並推進民主化與台灣本土意識。與此同時，兩岸交流氣氛不良，中共持續於國際社會孤立台灣，中華民國現實為主權獨立國家，兩岸之間呈現敵對意識，互不統屬。

三、1986年時值20歲，開始為「威權轉型」世代。蔣經國於1986年宣布解嚴，確定「改變」、「改革」是必要的方向，開始推行自由化政策，後於1987年正式解嚴，成為台灣政治自由化之第一年，兩岸開始恢復人民之間的交流，也是起始於此。此時期經濟繁榮，1980年代末期出現各種社會抗議「風潮」、學生運動與「激進化」運動（如反杜邦、自由之愛、野百合運動等），前文提到的教改運動，也是此時由民間開始推動。

四、1971年時值20歲，開始為「危機愛國」世代。這一年中華民國喪失聯合國的席位，中國席位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代表。在此之前，台灣於1970年發生戰後最大愛國學生運動，通稱保衛釣魚台或保釣運動。此時期為所謂「風雨飄搖」、「莊敬自強」之時期，蔣介石政府陷入一連串的內憂外患，蔣經國接班，然後開始推動第一波的現實改革政策，加速政治改革與經濟發展，青年人以「愛國家」、「愛民族」為政治指引。

五、1970年時之成年人，為「威權大中國」世代，也是本研究中最年長的樣本組。此時期出生的受訪者，歷經多次重大政治事件，如抗日戰爭、國共內戰、中華民國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等，在台灣本島也經過二二八事件，以及中華民國政府撤退到台灣後的「白色恐怖」時期等。當時的蔣介石以「復興中華」、「反共救國」為最高使命，堅持中共暴政必亡，且自詡中華民國是世界上唯一合法代表中國的政府。

根據上述重大政治變動時間點，將年齡劃分五組（圖2、附表1）：以中國因素世代為參照組（14.1%），這相對也是最年輕的世代；其次為民主本土化世代（22.0%）、威權轉型世代（18.5%）、危機愛國世代（26.9%），以及最年長的威權大中國世代（16.2%）；其他回應設為遺漏值（2.4%）。

圖2：政治世代的分類

第一世代 威權大中國 時期	第二世代 危機愛國 時期	第三世代 威權轉型 時期	第四世代 民主本土化 時期	第五世代 中國因素 時期
1951年及以前 出生者 (65歲及以上)	1952-1966年 出生者 (50-64歲)	1967-1976年 出生者 (40-49歲)	1977-1988年 出生者 (28-39歲)	1989年及以後 出生者 (27歲及以下)

注：括號內為2015年時的年齡。

政黨支持：此變項由兩條問題組成。<sup>18</sup> 第一條直接詢問受訪者屬於哪一個特定政黨的支持者，此為常見的政黨認同態度測量。此階段回答是國民黨支持者為21.2%，民進黨支持者為23.6%，其他各黨合計約4.2%。回答「沒有特定支持」、「都不支持」或回答無效者，合計51.1%，達一半受訪者沒有表露意見（表3）。研究者為能進一步分析，設計追問過去十年選舉，受訪者支持的候選人屬於哪一個政黨，希望能由投票偏好來推測其迴避的政黨支持回應；回答「都投給泛藍政黨」、「都投給泛綠政黨」者，各佔總樣本的11.6%和6.7%。本研究依據這兩條問題，得以將原本中立、無法歸類的回答，由51.1%降至32.7%（即表4的中立與其他）。重新整併受訪者的二階段回答後，分為：「泛綠」、「中立」、「泛藍」三種政黨支持態度，以泛綠為參照組（31.1%），中立者佔26.8%、泛藍佔36.2%。其他（5.9%）在後續分析時設為遺漏值（表4）。

18. 此組問題設計者為吳乃德教授，於中國效應小組之問卷設計會議中提出。階段一的題目為：「在國民黨、親民黨、民進黨、台聯、新黨等政黨中，請問您是哪一個政黨的支持者？」階段二的題目為：「過去十年的幾次選舉，請問您支持的候選人是屬於哪一個政黨？」

表 3：政黨支持的原始分布：二階段問法（%）

階段一		階段二（續問）	
國民黨	21.2	都投給泛藍政黨	11.6
親民黨	2.7		
新黨	0.6		
民進黨	23.6	都投給泛綠政黨	6.7
台聯	0.9		
其他（續問）	51.1	兩個都投過	23.8
		從未去投票	2.9
		其他	5.9
		階段一已答	48.9
(N)	(1277)		(1277)

注：本表數值為加權後結果。

階段一「其他」包括回答都不支持（8.3%）、沒有特定支持（40.1%）、其他（0.8%）、不知道（0.4%）、拒答（1.4%）者，續問階段二。

階段二「其他」包括不適用（2.1%，即選舉時沒有投票權），和回答其他（1.2%）、不知道（1.2%）、拒答（1.3%）者。

表 4：政黨支持整併後的分布（%）

泛綠	31.1
中立	26.8
泛藍	36.2
其他	5.9
(N)	(1277)

注：泛綠：階段一回答「民進黨、台聯」、階段二回答「泛綠」之合計。

中立：階段二回答「兩個都投過、從未去投票」之合計。

泛藍：階段一回答「國民黨、親民黨、新黨」、階段二回答「泛藍」之合計。

表 5：對台灣與中國大陸未來發展的信心（%）

	對台灣	對中國大陸
很有信心	7.7	20.0
有信心	46.0	48.1
沒有信心	30.2	15.9
很沒有信心	13.3	5.5
其他	1.0	0.7
不確定	1.8	9.8
(N)	(1277)	(1277)

注：本表數值為加權後結果。

「不確定」包括回答沒意見、不知道、很難說、不關心、不了解題意。

兩岸消長預期：由於近年來中國經濟持續發展，國際地位與影響及軍事力量上升，雖然也有內部治理的腐敗與專政等嚴峻矛盾的問題，但整體而言，中國年輕世代的民族主義情緒伴隨着國力上升（特別是在 2008 年北京奧運後）。若觀察台灣民眾對於中國未來的發展，認為「有信心」或「很有信心」的比例將近七成；但是民眾對於台灣自身發展的信心，則相對較低，大約只有五成半。反之，對中國發展「沒有信心」、「很沒有信心」的比例為兩成左右，但對台灣的發展沒有信心的比例也相對較高，達到四成以上（表 5）。<sup>19</sup>

台灣民眾面對中國的「軟、硬」語言，軟的如習近平的「兩岸一家親」、「同享中國夢」，硬的如「反國家分裂」、對台灣的武力威脅，在這兩種正面與反面觀點相互拉扯之中，預期

19. 題目為：「整體來說，請問您對台灣未來的發展有沒有信心？」和「請問您對中國大陸未來的發展有沒有信心？」

將影響到台灣人民對於台灣前途的判斷，本研究將此視為廣義的「中國效應」。

表 5 顯示，民眾對於台灣的未來有比較清晰的看法，回答「其他」或者「沒意見、不知道」等的比例只有 2.8%，而「有信心」的方向比例，相對於「沒有信心」的方向比例，比值為 1.23。但民眾對於中國大陸未來發展的看法比較不確定，回答「其他」或者「沒意見、不知道」等的比例達到 10.5%，而「有信心」的方向比例，相對於「沒有信心」的方向比例，比值為 3.18。初步來說，台灣民眾對於兩岸消長的預期，以「看好中國而不看好台灣」的情形較為普遍。「對台灣」與「對中國大陸」看似是獨立的兩條問題，所以民眾在回答時，答案並不具有互斥性。例如，對台灣的未來有信心，可能對中國大陸的未來也是有信心的一端；反之，對台灣的未來沒有信心，可能對中國大陸的未來也是沒有信心。本研究將這兩條問題進行交叉分析。民眾對於兩岸未來發展有沒有信心的可能反應，重新分類後有以下五種組合情形：

- 一、「台長中消」組：對台灣有信心，但對中國沒有信心 (8.7%)。
- 二、「兩岸同消」組：對台灣與中國大陸都沒有信心 (12.6%)。
- 三、「台消中長」組：對台灣沒有信心，但對中國有信心 (27.7%)。
- 四、「兩岸同長」組：對台灣與中國大陸都有信心 (39.6%)。
- 五、其他，包含資料不全和沒有確定答案 (11.4%)。

整體而言，民眾以對兩者同時看好的「兩岸同長」的比例最高，佔了將近四成 (39.6%)，反映對於同步發展的預期或比較樂觀的期望。其次為不看好台灣，但看好中國的「台消中長」，即對中國的發展較為樂觀的一組，比例為 27.7%，達四

分之一左右；再其次為兩者都不看好的「兩岸同消」，其比例為 12.6%。而五組中最少的比例則是看好台灣，但不看好中國的「台長中消」，即對台灣較為樂觀的一組，比例僅有 8.7%，本研究選擇將其作為分析時的參照組。

表 6 顯示上述各個自變項與「同文同種」間的相關矩陣。三個年齡變項，即自然年齡 (a)、教改世代年齡 (b)、政治世代年齡 (c)。三者均由實際年齡 (或出生年) 加以計算分組獲得，故呈現高度相關 (Cramer's  $V_{ab} = .869^{***}$ ,  $V_{bc} = .836^{***}$ ,  $V_{ac} = .922^{***}$ )。研究者預期如果將三個變項，或者其中兩個變項，同時置於一個迴歸模型之中，恐將造成多元共線性 (multicollinearity) 問題，研究者將藉由層級迴歸模型逐步對此進行檢驗，並由相對最適合模型來挑選最適合的年齡分組方式。

本研究預期「政治世代」應為較佳的年齡分組方式，因此在表 7 僅使用政治世代作為年齡變項，並增加政黨支持和兩岸消長預期兩個政治態度的自變項，檢視所有使用變項間的相關係數 (Cramer's  $V$ )，可以看到各變項間並無高度相關的問題。

## 層級迴歸與模型檢驗

本研究繼而依據前述研究假設進行層級迴歸分析，分析分為兩個步驟進行。

### 第一階段：基本變項與「同文同種」的關係

第一階段的逐級對數迴歸分析 (logistic regression) 使用的社會屬性變項包括：性別、族群、教育程度，以及年齡四個變項，其中年齡包括三種不同分組方式 (自然年齡、教改世代年齡、政治世代年齡)。此步驟是要初步探究前述自變項與「同文同種」的關係。

表 8 共有五組迴歸模型，模型 1-1 與 2-1 使用了性別、族群、